

回归文献与历史现场： 重审汉水流域城市样貌的若干成说

——鲁西奇著《城墙内外》评介

王日根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11)02-0102-04

鲁西奇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府、州、厅、县城的形态与结构”的结题成果《城墙内外》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1月出版,全书共47万字。该书全面考述汉魏六朝、唐宋以及元明清时期汉水流域治所城市(及部分非治所聚落)的建城过程、城郭规模与形态、城郭内外之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划,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汉魏六朝时期从散居向聚居的演变以及城居与村居的对立、唐宋时期特别是唐代地方城市中里坊制之实施情形及其实质、明清时期治所城市城墙内外街区的功能分划及其原因等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之认识的观点。掩卷沉思,我觉得该书的成功之处在于以回归文献与历史现场的方式,重审了汉水流域城市样貌的诸多成说,从而提出了若干切近中国城市本源的新观点,读起来让人觉得亲切而逼真。

—

本来作者的目标是弄明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府、州、厅、县城的形态与结构,考述明清时期汉水流域的21座治所城市(府城5座、州城3座、县城13座)的筑城过程、规模、形状及其城墙内外的街区布局、功能分划,特别是选取汉水下

游地区的12座治所城市代表平原及低丘地区的城市、鄖阳府属7座城市代表山区城市、襄阳—樊城及光化—老河口则作为双子城的代表,展开细致考察,认为:明清时期,各治所城市均普遍发展形成了城下的街区,其尤甚者如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则形成为双子城。府、州、县城的规模、形制虽然与地方行政的等级的关系是明显的,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决定或者制约着前者。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乃至风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城墙内的城市”的论点,至少不适宜于对汉水流域城市特征的描述。城外街区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发展、人口增加而引发的对城垣的突破,毋宁说是一种原始的趋向:城外街区较之于城内,更便于体现城市的生产与交流功能。城外街区的发展与否及其发展规模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该城市在长距离贸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二是该城市乡村经济腹地的范围及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三是其城内市区的规模。

作者在对每一个府、州、厅、县城之形态与空间结构的实证考察时,重点关注了下列问题:

(1) 始筑年代及其在明清以前的筑城情况;(2)

[收稿日期]2011-02-21

明清时期(有时也适当下延至民国初年)城池的修筑与维修过程;(3)城垣的规模、形制及其变化,特别注意城周、城门、形状的变化;(4)城外街区的形成、发展及其位置之确定、空间形态等;(5)城内市区的街道与功能分划,特别注意公廨衙署、儒学等官立机构的位置,市场与居民区之所在,以及城内街道格局与城门、官署、市场的关系等。由于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中对街道、市场、居民区的记载大都仅限于名称,而于其具体位置则不甚详确,作者通过对其相对方位的辨别、地名沿革的分析,并结合地图(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地图)、游记与实地考察,尽可能地将其落到实处,弄清其所在位置(今地),并尽可能绘出示意图。作者在对影响府、州、厅、县城之规模、形制与空间形态的诸因素分析时,兼顾到了行政等级、历史继承、微观地形与地貌、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功能、传统文化(特别是风水理论)等因素。特别关注这些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城市形态与结构的不同影响,特别注意历史继承对明清城市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商业功能对城外街区发展的影响、以及风水理论对城门选址与城门闭启的影响等问题。这些对每一座城市的实证考察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综合比较,均有利于得出一些至少适应本地区城市的一般性认识。作者在做城市生态分析时,聚焦于人口和居住区,着力探究(1)是否存在相对集中的商业区?(2)是否存在缙绅、富商居住区与平民、贫民居住区的较为清晰的分野?(2)是否可以对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等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作者选取资料条件较好的汉阳、德安、安陆、襄阳、汉中5座府城及沔阳、天门、潜江、京山、竹山等州县城,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积累了若干实证研究资料,并尝试着作出一些超出本区域研究的一般性认识。

作者在研究中首先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城市呈现出“城墙内的城市”样貌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作者所研究的12座明清时期治所城市中,均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城外街区,其中接近一半的治所城市的城外街区规模比其城内部分还要大。因此,“城墙内的城市”的论

点,至少不适宜于对汉水流域治所城市特征的描述。通过考察城外街区的发展及其与城内的关系,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城外街区的起源与发展原因。对于城内市区内部是否存在着功能分区的问题,作者觉察到行政区与士绅聚居区的存在是明显的,但是否存在中心商业区却不能妄下定论。而城墙内外市场位置的确定及其专业分化、集市周期等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为治所城市之经济功能的探讨找到一个突破口。作者在文献辨析的基础上,充分使用方志地图、晚清至民国测绘地图与现代地图互相比勘、印证的方法,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考定了每一城市中街道、市场乃至城门、官署等地理事物的具体位置。

既然明清城市并不都表现为“城墙内的城市”,那么继续往前追溯之后,作者更发现: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地方城市中并非实行严格的、以坊垣(或篱栅)围绕的封闭式里坊制,自两汉以迄南北朝,中国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也并非如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城居(由此而推演出所谓“城郭国家”理论)向村居演变,而是恰恰相反,即由“散就田业”的散居状态向以城壁坞堡为中心的聚居(城居和附城居)演变。这些观点的提出具有学术价值,至少是为中国本土城市史理论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作者在对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府)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时,考述了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的14座州(府)城与44座县城城垣之有无及其形态、内部空间结构,认为:唐宋时期汉水流域州县治所城市大部分均沿用南北朝后期所筑城垣,其规模较小,多属戍城性质,城内较少普通居民;唐中后期至五代宋初,部分州(府)城增修或扩修了罗城,形成子城、罗城二重城垣格局,原先附城而居的居民被包括在城郭之内,居于罗城之中。唐前期汉水流域的州县治所城市里未形成以坊墙(或篱栅)分隔的封闭式里坊制,襄阳城内外的里坊,主要是指居住区块,是户籍控制、治安管理与征收屋税的基层行政单元,并不一定以垣篱围绕、形成土封闭性区块;中唐以后,大抵只在罗城内分划里

坊,子城内未设里坊,换言之,南方一些州府治所城市中的里坊,大抵是唐中后期乃至五代十国时期增修或拓展罗城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

继续向前追溯,作者以今本《水经注》所见汉水流域之城邑聚落为线索,逐一考定其具体位置、置废过程及其形态,认为:两汉时期汉水流域特别是汉水中游及上游汉中盆地虽密布城邑及较大聚落,但乡村民众之基本居住形态仍以“散就田业”亦即散居为主;自汉末以迄于南北朝后期,无论势家大族,抑或普通著籍民户,大抵皆集中居住于城堡坞壁或其附近,形成城居状态;而未著籍之蛮流则散布山野间,以散居为主。聚落形态的这种演变,既是此数世纪间政治与社会大动乱的反映或缩影,也是社会大动乱背景下民众基于生存需要而作出的“适应性改变”。再看汉代南阳地区,亦呈现出同样的状况。

经过如此不断上溯的过程,我们便能对汉水流域城市聚落长时段的发展变迁有系统的了解,线索由此清晰。

二

本书中在反思若干固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见解,譬如作者说“我们既未见到隋唐时期朝廷要求各州县修筑城郭的制度性规定,也未能证明绝大多数的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只是罗列出部分重要州县城筑有城郭的例证。仔细考察有关史实,我们发现,可能大多数唐代州县治所在唐前中期(天宝以前)并未修筑或重修城垣,或沿用南北朝以来的旧城垣,其城垣是在‘安史之乱’后才修筑起来的”。(第256页——257页)此种分析路径属于反向思维,是在避开固有的成见之后而实行的原初思考,具有说服力。确实,州县治所本来主要住官员与衙署,它可以通过堂皇的衙署来彰显自己的权威,在没有战争威胁的地区,城墙实在没有建筑的必要。

再譬如,作者认为“由于里(坊)是以户口控制为目的编组的基层行政单元,所以,在有子、罗城两重城郭的城市里,一般只是罗城内分

置里、坊,子城内大约并不区划里、坊;在那些沿用南北朝后期所筑戍城、规模较小的治所城市里,所居既主要是官吏军兵及其家属,民户甚少,亦无必要分置里、坊。所以,在唐前中期,很可能只有在那些规模较大的州城罗城内才设置《大唐令》规定的、与乡村之‘里’并列的‘坊’(也可称为‘里’);未立罗城的州城附郭及大部分县城,当与周围乡村一样,设置乡里,属于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系统。”(第265页)但是罗城后来经历了扩建,里坊制获得了在地方城市中普遍推行的机会。这一论述应该较切合历史事实。

又譬如:作者在思考明清城市“城内是否存在相对集中的商业区?是否存在富人区和贫民区的较为清晰的分野?”两个问题时,对前一个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以‘史料之无’断定‘史实之无’显然是危险的。”由德安地名发现的“一些称为择衣街、鲜鱼街、箩筐街等明显以商品名称命名的街道,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些街道很可能就是其同名商品的专业市场。同时,江西会馆街、上下玉石街、石灰街等街道名称虽然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但认为它们可能是商业街区也并非全无道理。”(第365页)这实际上是确认某些城市确实存在商业集中区的观点,否定了过去无商业集中区的固有说法。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存在士绅居住区和不存在士绅居住区的实例都有。这也是很合情理的判断。

作者认为:明清城市“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引力的影响:一是向传统礼制的复归,二是适应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前者引导城市形态向符合礼制的、规整而呆板的形态方向演化,而后者则促使城市的形态突破礼制的规定,相对自由地扩展城区。”(第440页)因此,所谓“城墙内的城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作者也认识到“很难判断这两种引力和演化方向究竟是何者占据主导地位,也很难笼统地论断北方平原地区的城市形态在向传统礼制复归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南方地区因为商业经济更为发达之故,其城外街区的自由拓展更为突出。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每一座

城市之所以形成其独特的形态与面貌,都会有其自身历史、微观地貌、制度安排、经济生活之需求、文化阐释(特别是风水方面的考虑)乃至“长官意志”等多方面的原因,探究其形成与演变过程,分析其成因,考索其意义,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弄清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还仅仅是迈向城市社会与经济结构研究的第一步。”(第443页)显然作者要表达的影响明清城市形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局限于传统礼制和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发展两个方面,不过应该承认这两种因素确实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明初、清初王朝建立之时统治者强势推行传统礼制政策下,这种倾向非常明显。作者还认为,以往关于城市功能区形成是一个自然过程的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而“更倾向于强调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分划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不仅是政治制度)安排而产生的,是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的结果。换言之,城市内部的区划,主要是王朝国家利用权力对城市空间进行‘切割’、‘划分’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从外部对城市功能做出的强制分划,并不是城市据其自身发展需求而‘自然发展或演化的结果’。在国家权力‘切割’而成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墙发挥了一种标识性工具的作用。”(第448页)我们或许可以把城墙看成是彰显权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在和平时期,城墙的功能只剩下彰显权威的方面,因为衙署、其他公共建设均具有彰显权威的功能。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亦有些独到之处,主要表现为三点:

(1) 从历史文献出发,仔细辨析文献记载,审慎地使用相关史料以考证历史地理问题。本书在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仔细辨析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认真比对不同时期、

不同著述和同一著述不同版本中的记述,梳理清这些记载的因袭变化关系,明其源流,辨其真伪正误,然后才据以考证相关问题。

(2) 充分运用碑石与考古资料。本书尽可能全面收集了汉水流域的碑石资料,并与传统文献记载相结合,展开细致考察。在考古资料方面,除了使用普查材料与部分考古发掘材料外,作者还进行了多次实地踏勘,取得了一些踏勘调查资料。

(3) 尽可能开展实地考察,将实地考察所得之感性认识与文献研究所得之初步结论相互印证,从而力图将古代城市的轮廓与重要地理事项落实到今天具体的地理空间上,最后绘出地图。本书所研究之汉水流域古代城邑聚落中的大部分,作者均曾进行过时间不等、细致程度不同的实地考察,并绘出了部分古城的实测图。

三

本书学风严谨、求实,在充分汇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深入、细致,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文风平实。书中对前人的成果虽有充分的借鉴,但都有明确的出处,尤其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重大推进和创新,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素养。

该书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出土资料和田野调查,对古代汉水流域的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这一地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此成果既可供城市史与城市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者参考;其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考证与认识,亦可供相关城市建设规划与研究部门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规划部门参考、使用。